

袁进  
著

ZHONGGUOXIAOSHUODEJINDAIBIANGE

# 中国小说 的近代变革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CIP)数据

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 / 袁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33-8132-2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文集—丛刊—第1册—第1分册  
I. 120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3201号

袁进 著

# 中国小说 的近代变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袁进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5633 - 8255 - 2

I. 中… II. 袁…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9201号

组稿编辑:武春野

责任编辑:武春野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字数:150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前 言

文学史的研究总喜欢挑好的话,哪一部作品如何优秀,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哪一位作家如何天才,创造出不凡的业绩,等等。如此一来,在研究者看来不好的作家和不好的作品,自然就失去了进入“史”的资格。

中国近代小说偏偏是一个令文学史家棘手的问题,作品的数量虽多,若是论起审美价值,绝大多数作品都很缺乏,这是一批艺术上质量不高的小说,许多作品就连我们研究近代小说的人,也觉得难以卒读,尤其是历来被认为是近代小说辉煌期的清末小说。即使以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名作“四大谴责小说”而论,艺术水准也都不及它们的古代前辈,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值得进“史”的人物典型。倘若按照审美价值来取舍,够资格进“史”的作品也为数寥寥。然而,中国近代小说又是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不能绕过的环节。

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便不得不在这一堆平庸的作品中仔细发掘,爬梳剔抉,找出它们的“新变”。其间我们确实寻找出许多过渡特征,勾勒出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渡线索。但是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只要是“变”,就都给它们装上一个“新”的光环;只要是“变”,就都是对传统的“革命”,是一次“解放”。假如有一个平庸的人,我们把他身上的所有

优点聚集拢来,加上一个个光环,不难把他打扮成一个“英雄”;倘若再把他的缺点加以美化,更不难塑造成一个“完人”。文学史研究也同样如此。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涂抹的小姑娘,如果光有在平庸的作品中美化研究出来的“史”,它的历史“真实”性便会发生问题。补救的办法也许是:我们还需要有另外的“视角”,着重寻找一下造成平庸的原因,总结历史的教训。

人们很少注意到一个事实: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就小说而论,它能够贡献给世界文学的一流作品并不多,与别的国家的文学贡献给世界的一流作品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作品,恐怕还数18世纪问世的《红楼梦》。中国古代文学中,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最为接近,最容易转化的,也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小说传统。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承担着中国小说“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它理当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优秀小说传统的转化更新创造条件,开创一个适合其变革创新的新环境。然而,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几乎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优秀小说传统,此后,它一直受到压抑,只能曲折地生长发展。这是为什么?

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全盘否定传统,人们不断反对传统,却又时时感受到传统阴影的威胁。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全盘否定传统只是一种姿态,它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人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之中,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正确的途径是:我们继承合理的传统加以创新,剔除变革那些腐朽的传统。伽达默尔曾经指出:“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sup>①</sup>中国近代的小说家理论家们究竟是怎样继承选择的,怎样“理解着传统的进展而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呢?这便是本书试图探讨的

<sup>①</sup>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引自《哲学译丛》1986年8期。

问题。

中国近代小说有着与中国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不同的特殊矛盾：例如，中国近代政治既促进了近代小说的发展，使它进入文学的殿堂，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促进它学习外国小说，加快变革，但是又延缓了小说的成熟，将小说作为政治的扬声器，造成小说对“人”的轻视，对“个性”的忽视。中国古代小说远离政治，自然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又不受政治促进。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小说的特殊矛盾。又如，中国近代小说几乎是一下子突然繁荣起来，数量众多，如潮水一般滚滚而来，可是伴随着小说数量的繁荣，读者的增加，却是小说质量的低劣，小说家、理论家对小说艺术特性的轻视。这种量与质的鲜明对比，既不见于古代小说，也不见于现代小说。再如近代小说是求“新”的，梁启超办的小说杂志就命名为“新小说”，以区别于《红楼梦》之类的“旧小说”，其实从文学观念上看，梁启超的“新”反倒是比《红楼梦》“旧”得多，求“新”反倒是得了“旧”。这在中国古代，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在中国现代，也没有这么典型。

中国近代的小说家也有自己独特的矛盾，他们创作小说是为了“觉世”，而不考虑要“传世”；他们一面推崇小说，一面又鄙视小说；一面享受着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一面又为自己创作小说而自责痛悔。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小说家都没有这一层作茧自缚的烦恼。又比如中国近代小说家大都富于激情，但是这激情却很少能转化为作者的艺术个性，他们的艺术创造力因此显得疲软。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古代和现代部分作家身上，但是却没有像近代小说家这么普遍。

中国小说进行近代变革时，它实际上是出现了双重的移动：小说由文学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和中国小说向外国小说移动，学习接受外国小说，使中国小说外国化。它意味着小说近代变革面临的双重任务：进入文学的殿堂，改变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和促使小说“近代化”。这双重任务本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是在政治催生下的“早产儿”，

这双重任务之间因为指导的文学观念不同,便产生了特殊矛盾,而这样的矛盾自然也不见于中国的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

特殊的矛盾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抓住这一阶段的特性,分析这些特殊的矛盾,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小说家、小说理论家、批评家,还有小说读者们是“怎样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的”。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本该继承《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优秀小说传统,将它转化更新为近代小说,结果他们却选择了儒家文学观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传统。作出这一选择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决定的。但是这一选择毕竟不利于中国小说的发展,它不仅造成了近代小说的平庸,而且影响了中国小说的长远发展。为了这一选择,中国小说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书打算从分析中国小说近代变革的特殊矛盾入手,逐步展示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小说中的进展与转化,并且试图勾勒它所造成的影响,将它与某些具有可比性的外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以便我们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或许这样的总结在今天也还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囿于本人的水平学力以及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书中不当之处一定很多,尚祈读者见谅,并期待方家指教。

为了减少注释,本书凡引用的近代小说理论资料及近代文学理论资料,只见篇名不见书名、刊名日期者,均见于下列各书,读者可以自己核对,笔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卷本，三联书店 1977 年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史料·索隐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变革的征兆	1
第二章 政治的双重作用	22
第三章 量与质	43
第四章 新与旧	61
第五章 传世与觉世	85
第六章 激情与个性	106
第七章 两个移动	129
第八章 影响	151
第九章 中外小说近代变革的比较	173
结 语	195
再版后记	200

## 第一章 变革的征兆

“小说”的观念在中国 20 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将“小说”作为运用想象的事实,表现人生的情境、真理,探求心灵奥秘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实际上是外来的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产物。<sup>①</sup>这一小说观念在中国小说界确立,为作家和读者们广泛接受,大约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仍旧是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占统治地位。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于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个“小说”,指的是琐屑的言谈。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豢狂夫之议也。”它说明了“小说”的几个特征:第一,它是允许虚构的,而按照孔门崇实的标准,虚构的本身就已降低了它的价值。第二,它是士大夫正人君子不为的,它的作者读者都是闾里百姓,社会中下层。第三,它反映出的老百姓

---

<sup>①</sup> 我在这里用“近代化”而不用“现代化”,因为它虽然成就于中国现代文学阶段,实际完成的却是“近代化”的任务。

想法,可以补充士大夫的认识,并非全无价值。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已经基本散佚了,但是这一小说观念却成为后来的正统士大夫对小说的看法。尽管中国的小说创作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有了极大的发展,小说理论也出现了各种变化,无数士大夫早已打破了不创作小说的戒律,但是中国社会对“小说”总的认识,却始终受到“小说是小道”和“君子弗为”意识的制约。小说不得入于文学之林和小说家不敢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上署上真名,就是它造成的直接后果。

古代“小说”的范围要比今天宽泛得多,按照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它至少应当包括杂录、丛谈、辨订、箴规,以及合乎今天“小说”范畴的“志怪”和“传奇”。古代“小说”概念的宽泛实际上对中国小说的发展颇为不利,因为丛谈、辨订、箴规与志怪、传奇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前者是议论,后者是叙事;前者切实,后者虚构;前者是学术,后者是艺术。把它们混在一起,归为一类,使得人们很难从中总结出能完全涵盖它的艺术规律。中国小说理论往往只能局限在一部一部具体作品的艺术规律的总结,而难以上升到对小说整体的认识,即使如金圣叹这样杰出的小说批评家,也只能把他的批评对象集中在《水浒》一部书上,不敢使之上升为对“小说”的概括。事实上,在古代“小说”概念范围内,虚构的志怪传奇,<sup>①</sup>其地位也远在丛谈、辨订、箴规、杂录之下。一直到酝酿“小说界革命”的1897年,提倡小说甚力的邱炜萋也不得不承认:“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孤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挈长而较短也。”<sup>②</sup>小说处于如此低下的地位,创作者自然产生了两种态度:一是极为轻浮随便的游戏态度从事创作,将它作为“游戏笔端,资助谈柄”<sup>③</sup>的文字游戏。一是为小说的存在寻找根据,引申发挥孔子的“必有可观者”,强调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

① 六朝人的“志怪”其实也是作为纪实的,但后人就未必了。

② 邱炜萋:《菽园赘谈》1897年刊本。

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教,供谈笑,广见闻”。<sup>①</sup>可以“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sup>②</sup>。由此引申出小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提高小说的地位。这两种创作态度,前者固然是承认小说为“小道”,后者虽然意在提高小说地位,实际上把“资治体,助名教”的大帽子套在小说头上,要小说向“治体”、“名教”靠拢,也就等于承认不能“资治体,助名教”的小说仍是无地位的“小道”,其实仍是对儒家“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认同。

这两种创作态度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两类小说,一类以“怪”和“奇”为趣味,即使是描写自己身边的社会生活,也以奇闻怪事为题材,注重小说的娱乐性、游戏性,它们往往以极为肤浅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轻视人生的体验,忽视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求,一味追求表面的情节热闹和美满结局。一类带有较强的急功近利色彩,以劝惩教化为目的,人物是正邪忠奸,界限分明,缺乏对社会的深刻观照,对人生的真正体验。在实际创作的小说中,这两类小说大多是“混合型”的,很少以单一的面貌出现。许多以“劝惩”为目的的小说也以“怪”和“奇”为趣味;许多娱乐性小说的后面又加上“劝惩”的尾巴,在中间发些警世鉴戒的议论。

但是,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又产生了新的创作态度和新型的作品。作者出于对人生态度的深度体验和对社会的观照,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创作小说,像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既不抱游戏态度,也不以“劝惩”为目的。他以一种艺术大宗师的态度,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的完美,追求艺术的永恒,将自己的整个人生体验,与小说创作融为一体。这种出于自己内心需要、情不能已的创作,超越了以劝善惩恶为目的的急功近利和游戏消闲的娱乐主义态度,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境界。因此作者可以在小说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超凡出众的对人生的真正体验和对社会的深刻观照,从而达到生活的深处。我

---

① 曾慥:《类说序》。

② 凌云翰:《剪灯新话》序。

把这第三种新的创作态度和产生的作品,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作品大都是在这种创作态度下产生的,首当其冲且进入到真正艺术的境界。虽然它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前两种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浸染。有时同一位作家会创作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有时一部作品中也可能出现这三种倾向的混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实际上蕴含了文学的近代意识。它意味着文学开始摆脱文字游戏和实用工具的地位,不再附属于某些其他学科,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表现人生的艺术,一味追求奇闻怪事,以娱乐为指归,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以“劝惩”为目的,将文学作为实用的教化工具,使文学成为伦理道德的附属品。伦理道德是一定社会规范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变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核心——纲常名教,就随着帝制的被推翻而逐渐被否定。真正的艺术作品,它的生命力要比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长久得多。文学是人学,作家只有站在艺术的立场上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把握人,探索人的心灵,追求人生的真谛,才能超越“劝惩”的目的,摆脱特定时代的具体的伦理道德的限制,将人生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品味去思考。《金瓶梅》的涵义,绝非简单的善恶标准所能涵盖,对这部作品的道德章义怎样评价,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但已无人否认它是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按照清代的伦理道德标准,贾宝玉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败家子”。曹雪芹正是由于坚持艺术的立场,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把握人,追求人生的真谛,才使这个“败家子”萌发出冲破礼教束缚的冲动,成为真正的“人”,因而才超越了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反礼教的意义。<sup>①</sup>清代描写“败家子”的小说不少,《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作品就是因为

---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本人创作《红楼梦》时并不具有明确的“反礼教”的目的。可参阅张毕来《漫说红楼》的分析。

以“劝惩”为目的,没有努力坚持艺术的立场,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去把握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无法与《红楼梦》相比。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清初金圣叹的性格塑造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作家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创作作品,不受特定时代伦理道德规范的束缚和文学表现人、追求人生真谛、探求心灵奥秘的特点。这种认识比封建社会的“表情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因为“表情说”的“情”可以是“人”的真情,也可以是经过异化后的“非人”的伪情,这样就失之于笼统。李贽和金圣叹都极为推崇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他们在提出新的文学主张时大量总结吸收了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五四”以后,周作人将晚明的“性灵派”文学运动视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sup>①</sup>就是因为“性灵”主张本身含有强调从作家的人生体验出发的艺术立场,他也是从文学表现人生的近代意义出发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中,《红楼梦》无疑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它是集大成的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优秀传统的总结。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史看,一部中世纪文学优秀传统的总结性作品,往往在总结的意义上开启了未来,预兆着近代文学新纪元的诞生。但丁的《神曲》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up>②</sup>《红楼梦》除了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之外,是否也预兆了近代文学新纪元的开端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鲁迅便曾肯定:“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sup>③</sup>从近代现实主义的角度总结了《红楼梦》开启未来的一面,这还仅仅说的是“写法”,尚未涉及到“思想”的方面。

① 参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

② 恩格斯称但丁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红楼梦》虽然是乾隆前期创作的作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价值昂贵的手抄本形式问世的,这使它主要成为上层士大夫的案头消遣品,而很少在以中下层文人为主的小说作者圈中发挥影响。一直到1791年,程伟元将前八十回与高鹗的后四十回续稿合在一起,以活字版排印,从此《红楼梦》才广泛流行。因此,它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说来也是19世纪的事情。《红楼梦》开启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风气,使得中国19世纪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19世纪的中国小说家尝试作出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开始显示出一定的近代色彩。

曹雪芹逝世的这一年,正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诞生的时候。<sup>①</sup>《浮生六记》大约问世于嘉庆年间,书中并未提到当时已经开始广为流传的《红楼梦》,但作品中表现出的由于注重人生体验而萌发出的“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却与《红楼梦》是一致的。它们集中表现在主要人物的叛逆性格上。沈三白有着与贾宝玉相仿的个性特征:他们都不因循守旧,在社会中随波逐流,泯灭自己的个性,他们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发展个性的要求,希望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说贾宝玉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格言上表达过他独特的个性见解,他厌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格言,不肯走做八股、应科举的仕途经济道路,不愿牢笼自己的个性,那么,在沈三白身上,也有同样的要求。他曾公然表白:“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他寄居于友人的“萧爽楼”中,“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陞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清缄默”。四忌四取表达了他与曹雪芹相近的理想和做人的信条。他崇拜自然,甚至在他鉴赏风景时,也时时流露出自由发展个性的要求:“吾苏虎丘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因此他批评:“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玲

<sup>①</sup> 曹雪芹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64年,在沈复诞生的第二年。

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穴,全无山林之势。以余管窥所及,不知其妙。”只消将这些大胆的批评同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稻香村的批评略加对照,便不难看出他们崇仰自然发展、憎恶人力束缚的共同个性,而这种个性自然发展的要求与后来龚自珍所写的《病梅馆记》又是一脉相承的。《浮生六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全书,与这种个性自由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个性自由发展的要求本身就是合乎自然的,他们在面对大自然的优美景色时,能够自觉地解除一切人生束缚,沉浸在个性自由的欢乐中:“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弘扬个性者往往多为人性论者,憎恶束缚个性也常常意味着憎恶束缚人性。因此,沈三白对过着禁欲生活的和尚充满同情,他会悄悄地塞四个馒头给正在“眈眈旁视”的小和尚,全不顾这样做将会打破和尚的戒律。他对和尚守戒发出慨叹,断言做和尚只可居于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终日不见不闻,或可修真养静。若吾乡之虎丘山,终日所见者妖童艳妓耳,所听者弦索竹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安得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哉”。从这些慨叹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和尚的同情,对禁欲的非议。

《浮生六记》也继承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选奇闻怪事为题材,刻意描写自己身边平凡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极为动人的生活情趣。作者敢于运用第一人称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真实地揭露了自己的父亲不能容忍自己的贤妻,举家被逐出大家庭,过着颠沛流离的凄惨生活的悲剧,从而展示出封建宗法制下的家庭,家长具有的权威和冷酷。需要指出,作者这种刻画本身就是背离儒家“子不言父之过”的道德信条的,因而具有反礼教的意义。但是“反礼教”并不是作者创作的目的,他仅仅是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他的父亲形象绝非一个脸谱化的人物,由于坚持从人生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者“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作品也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近代人文主义意识的觉醒,除了自由发展个性的要求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人曾经指出：“光宣之际，及其以后，中国妇女的解放，实为中国社会变革及其人文价值转向的一大动因。因它直接动摇到民族社会的基础，家庭及家族主义。有如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发现了‘人’而逐渐放弃了社会的规范。”<sup>①</sup>其实，这一要求早在《红楼梦》中就已现出端倪，曹雪芹认真描写的“几个异样女子”，提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已经体现了作者对妇女的尊重态度。其后，俞正燮曾抓住妇女贞烈问题公然提出：“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sup>②</sup>他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主张“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自礼义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sup>③</sup>公开提倡如女子不能再嫁，则男子不能再娶；如允许男子再娶，就不能攻击女子再嫁。在礼法的遵守上，男女应是平等的。俞正燮的主张，“五四”后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赞扬。<sup>④</sup>

从19世纪初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尊重妇女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浮生六记》的陈芸是一位介与薛宝钗和林黛玉之间的小家碧玉，她热爱吟诗，颇具灵慧，理解丈夫的叛逆性格，而且自己化装成男人随丈夫一起上街看灯。在她的内心深处，是一位充满浪漫气息，具有真性情的妇女。但是，她又自觉地以礼自守，孝敬长辈，一心要做一名贤妻良母。这样一位聪明贤惠的媳妇居然不能见容于公婆，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仍被公婆赶出家门，逃不脱悲剧的命运。清代以“孝”治天下，法律保障家长的宗法权益，衙门可以处分“忤逆”的儿子却不问无理的父母，因此，沈三白的父亲可以限令三天，要沈三白一家搬出家门，否则就到衙门里去告沈三白“忤逆”。沈三白不敢公然对抗礼教，尽管他也为夫人陈芸的遭遇不平，对父母的昏庸专制不满。他也悲愤地责问：“呜呼，芸一女流，具男人

①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自童年至弱冠》。

② 俞正燮：《癸巳论稿·贞女说》。

③ 俞正燮：《癸巳论稿·节妇说》。

④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